形成新旧动能转换“加速度”

洪观平

中经观点

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既要加快培育发展的新动能，也要积极改造提升传统动能，实现“增量崛起”与“存量变革”的协同并举。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做大做强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平台，激发社会创造力，提高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创新要素的集聚，推动“中国制造2025”等重大战略不断突破，形成新旧动能转换“加速度”

在增速换挡、结构调整的经济新常态下，新旧动能转换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之一。以新旧动能转换的澎湃力量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、迈向中高端水平，不仅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，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。

去年以来，我国围绕“三去一降一补”五大任务，不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经济运行不仅没有出现“硬着陆”，而且实现了稳中向好、结构优化、就业扩大的目标。今年前4个月，中国经济开局良好，进一步巩固了稳中有进的好势头。从各地实践看，凡是新旧动能平稳接续的地方，其经济增长也较为稳健。

当前，我国经济发展已走到了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节点。在这个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，需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提高各方主动适应和提升服务新动能加速成长、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能力和水平。

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既要加快培育发展的新动能，也要积极改造提升传统动能，实现“增量崛起”与“存量变革”的协同并举。事实上，新动能与传统动能是不可分割的，新技术、新业态在推动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、焕发生机。要精心培育以技术创新为引领，以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等为核心，以知识、技术、信息、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新型生产力，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、消化过剩产能，推动传统动能的转型升级。

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要推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升级的互促共进，通过服务创新和产品质量的提升，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供需结构匹配与优化。与此同时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，我们要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，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，抢抓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，积极培育我国对外开放新优势，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，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增强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，这些有利因素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。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做大做强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平台，激发社会创造力，提高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创新要素的集聚，推动“中国制造2025”等重大战略不断突破，形成新旧动能转换“加速度”。

对此，一方面要激发新生产要素流动的活力，通过促进知识、技术、信息、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、有效集聚，强化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应用机制，形成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内生动力；另一方面要创新管理、优化服务，探索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，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，为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提供强有力支撑。

当然，新旧动能转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甚至还是一个伴随着阵痛的调整过程。对此，我们不仅需要耐心，更需要勇气和魄力，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综合考量、统筹谋划，加快形成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新动能。

抢人还要会留人

丁慎毅

据报道，武汉“户籍新政”日前实施，18项户口迁移政策调整，大学毕业生落户几乎“零门槛”，南京、西安、长沙、郑州等地近期也均推出了宽松的落户政策。

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快速上升，“逃离北上广”成为热门话题，不少二线城市也伺机推出了吸引人才的政策，给钱、给房、给户口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筹码。目前看来，二线城市这些吸引人才政策的效果还是较为显著的。以武汉为例，2009年至2016年武汉人口净流入量快速增长，从2009年的74.45万人增至2016年242.78万人。2016年净流入人口约为2009年的3倍余。

不过，一个现实问题是，二线城市把人抢来后，是否能把人留住？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偏爱北上广深，是因为这些地方个人前景可选择的余地大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，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。但在一些二线城市，合适的工作岗位少，工资相对低。以安卓工程师为例，北京的平均薪资几乎是武汉的两倍。如果就业、收入、公共服务等短板没能及时补上，这些成本可能抵消了本城市对大学毕业生的诸多优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把人抢来了，但当地的综合气氛又把人“呛”着，就难以真正留住人。

这就需要抢人的二线城市，把重心放到公共服务建设和产业规划发展上来。用完善的公共服务来节约人才的时间成本，用多元化的产业来增加人才的选择机会，用公正高效的政府行政能力来减轻人才的公平忧虑，用文明城市的形象来减轻人才担心的道德摩擦，用安全放心的法治环境和空气环境来强化人才的居住信心。只有这样，人才会不请自来，才能有真正的获得感，也就来了不愿再走。

用好“寸土寸金”之地

奚旭初

据报道，北京市日前出台文件，明确疏解腾退空间优先用于补充便民商业设施，每个社区蔬菜零售网点不少于2个。

这条新闻让人眼前一亮。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，促进创新发展，疏解后腾退的空间地处主城区，都是“寸土寸金”，这些“黄金地块”如果搞一个商业设施，或者出让给开发商建楼盘，政府可以赚个盆满钵满，但北京选择把“黄金地块”优先用于补充便民商业设施，确实难能可贵。

把“黄金地块”变为“小菜场”，不仅便民惠民，而且厘清了一个理念，这就是政府乃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和守护者，在城市开发和公众利益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契合点，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有更多的获得感。一座城市宣称要打造“人文城市”“宜居城市”，然而“人文”多不多、是不是“宜居”，并不是看宣传的话讲得美不美，也不只是看马路有多宽，大楼有多高，更重要的是，市民的“小菜场”有无位置，“理发店”“澡堂子”等便民设施够不够用，这才是对“人文”“宜居”的衡量，也是公平正义的题中之意。

商海春作(新华社发)

拒绝“过度”

有媒体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几家大型超市发现，粽子主要定位家庭消费，散装粽子一般10元左右一袋。商家表示，包装简易、分量易控的散装粽更受消费者青睐。促进绿色消费，整治过度包装是重要一环。数据显示，我国城市垃圾中有三分之一是包装，其中一半以上是过度包装。包装减量化、促进包装循环使用，呼唤广大企业深化对绿色包装的认识，也需要每一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切实增强绿色消费意识，从自身做起，从点滴做起，践行环保理念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（时 锋）

共塑“一带一路”区域价值链

程大为

“一带一路”智库谈

在“五通”中，“政策沟通”是制度保障，“民心相通”是社会根基。沿线国家应着眼区域内价值链塑造，将传统贸易领域拓展到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领域，实现真正的“贸易畅通”。为此，当前要突破基础设施匮乏的硬约束和资金匮乏的软约束，实现“设施联通”和“资金融通”。这就是“五通”的经济逻辑

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倡导通过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的“五通”，将中国与沿线国家连接起来，参与国际分工，创造大区域内的合作机会，探寻全新发展模式。

“一带一路”的一头，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东亚生产网络，有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国家；另一头是欧洲经济圈，活跃着以德国和中东欧为主的生产网络；中间则是经济深度凹陷区，许多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，铁路、港口、公路等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该地区难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。

基于这样的现实，“一带一路”大区域内的国家应如何顺应全球化趋势、实现发展目标？

首先，传统最终产品分工下的贸易仍是“一带一路”繁荣发展的主要驱动力。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，很多国家以自然资源、农业资源为优势禀赋，各国贸易互补性强，产业间贸易机会较多。今年一季度，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同比增长26.2%，高于同期整体外贸增速4.4个百分点，说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“贸易畅通”的重要性。

其次，形成“一带一路”大区域价值链是各国的共同发展路径。对处于深度凹陷区的国家来说，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是工业化，从而直接获取参与价值链的机会，实现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协同发展。对东亚国家来说，调整国内产业结构、建立地区层面的市场、减少区外依赖应是其工业化发展的近期目标。“一带一路”大区域价值链一旦形成，将产生区域内的市场和生产网络，实现区域内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发展模式。届时，区域内产品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将长足增长，真正实现“贸易畅通”。

再次，克服“一带一路”大区域内基础设施匮乏的发展瓶颈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估计，在2010年至2020年间，亚洲各国和地区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约8万亿美元。此外，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。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会影响贸易、投资能力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将“设施联通”作为了合作的重点领域。

最后，做好“资金融通”，解决沿线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形成不足、国际资本投入不够的双重困境。发展中国家人民收入水平低，低收入必然导致低储蓄率，低储蓄率又造成国内资本形成不足，生产难以扩大规模。即便是贸易顺差的国家，通常也不得不将贸易盈余投到美元资产上作为外汇储备，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资本严重缺乏。与此同时，在全球经济步履维艰的情况下，国际资本更多回流到发达国家。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，因为投资规模大、回报时间长，几乎无法吸引外资。如此看来，做好“资金融通”，才能为“一带一路”大区域内国家输送发展血液。

在“五通”中，“政策沟通”是制度保障，“民心相通”是社会根基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和基层支持。沿线国家应着眼区域内价值链塑造，将传统贸易领域拓展到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领域，实现真正的“贸易畅通”。为此，当前要突破基础设施匮乏的硬约束和资金匮乏的软约束，实现“设施联通”和“资金融通”。这就是“五通”的经济逻辑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行业

让青少年教育轻装前行

黄 鑫

近日，“学而思”培训机构在成都被责令整改，中小学生课外培训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当下，中小学生课外培训的火热并不会因为某个机构的整改而消退，一方面，主管部门需要更多理性思考，怎样多方位、全过程加强对青少年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管；另一方面，各方面要正视如何真正为青少年减负，到底要减谁的负。

近年来，中小学教育培训市场需求旺盛，行业规模不断壮大。庞大的市场机会，吸引了各种社会资本、投资主体进入。培训机构质量参差不齐，一些问题随之暴露。比如，借用知名机构办学欺诈造假，夸大和虚假宣传；追求低成本，降低办学条件，安全缺乏保障；从业人员和培训师资混杂，教学手段不规范，极易造成未成年人在培训中受到心理伤害或性格扭曲等等。

对于这些问题，监管部门必须加强把关，打好“组合拳”。要提升准入的标准，尤其是在准入环节制定更加严格的师资、办学条件等要素标准，杜绝劣质机构入场。要在准入阶段把履行教育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，设置相应的准入条件和考核指标。同时，过程监管更是重头戏。要加强对培训机构教学过程的定期检查、突击抽查，健全信息公示机制，建立社会监督公众平台，鼓励家长和学生参与培训机构监督，促进培训机构规范过程管理。

应当说，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培训市场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，行业集中度低，培训主体数量庞大，几个人的“作坊式”“游击队”式培训机构数量众多，由此也导致了培训过程的违规行为屡见不鲜。需要明确责任，加大违规处罚力度，消除“劣币驱逐良币”效应。

当前，更加需要思考的问题是，为何家长们对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趋之若鹜，管理部门对其整顿治理反而不被一些家长理解和支持？说到底，如果考试分数决定一切的机制没有改变，学生和家长肩上的“负”便难以减轻。中小学在校减掉的“负”只不过是转移到了课外辅导机构，这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压力和成本，还导致多元化市场监管困难，违背了减负的初衷。甚至于，在很多家长眼中，口碑良好、效果显著的培训机构才是“救命的稻草”。

对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必须与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方向一致。目前，中小学教育在朝着减负、去应试化的方向发展，这并非一日之功。减负并不意味着提前放学、自由活动，而是在课程设置上增加趣味性、互动性和丰富性，不唯成绩论好坏。同样的，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，应更多关注能力、素质等相关内容，抓住行业监管和洗牌的机会，为行业发展树立样板。

众声

李 伟
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

加快金融科技应用试点

当前，一些伪科技在金融科技创新中鱼目混珠。为了准确把握创新实质，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是一条很好的途径，既能帮助创新主体降低成本、提高创新效果验证，还能充分激发创新活力。基于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的金融风险防控，以及基于生物识别的身份认证与交易验证等，这类需求迫切、影响力广、普适性强的科技创新，应成为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的重点。在金融科技应用的初创期，可多借鉴国外先进经验，开辟创新试验田。但在金融科技成熟推广期，则要提升创新管理机制，为创新保驾护航。

周宏宁
工信部工业品牌培育专家组组长

中国品牌不是微观概念

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需要高质量的品牌群体。5月10日被设定为中国品牌日，但我们不仅要有一批好的中国企业品牌，更要有一个共同的中国品牌，让全世界消费者看到“中国制造”这几个字时，联想到的不仅仅是某个企业品牌，而是中国制造的整体美誉度认知感。这应当是中国面向全球消费者做出的价值承诺，给全球经济的一个中国贡献。培育中国品牌不是一个微观概念，而是通过产品打造中国制造、中国服务、中国形象的核心价值体系。

王小川
搜狗首席执行官

机器尚无人工通用智能能力

识别、决策、生成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应用。比如，在决策方面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提高决策效率，提升商业效率，这在金融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已有很多应用。在识别和生成领域，人工智能的进展已使人机交互越来越自然。但目前来看，人工智能还局限在特定的封闭领域，并不能发挥创造性，需要依赖于来自人的数据。机器并不具备人工通用智能能力和解决开放型问题的能力。

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、漫画，来稿请发至：mzjjgc@163.com

本版编辑 牛 瑾 马洪超